

读书山与元好问精神

——遗山书院的建设之路

□陈 岱

问这位老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一次聚会中，了解到禹王洞的经营者郭秀先生建了一座遗山书院，便琢磨自己能不能为元好问文化的弘扬、传承做点什么，让元好问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得以进一步发扬，泽被世人。于是在与郭秀先生沟通几次后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决心携手打造一座将现代与历史相融的文化传播高地，全面呈现元好问的生活、成就等。隔着 800 多年的时光，我这个花甲之年的老人和一代文宗元好问产生了链接，带着对元好问精神的探索和追寻，开始了遗山书院的建设之路。

刚到书院时，条件异常艰苦，书院地处偏僻，山路崎岖，因购物不便，我和妻子常常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天气里，靠吃馒头和泡面充饥。记得有一次大雪封山，我们在下山采购生活物资时，汽车滑到路边，差点儿就翻到深沟里。即便这样，我们都不曾有过退缩的念头，白天游走于城乡四方，遍访文人雅士，寻找碑文印记，晚上于灯盏下翻阅史籍古典，整理元好问留下的诗文、著作。五年的时间，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，终于完成了遗山书院的软、硬件建设，复建修葺了元好问幼时读书的福田寺，在山野之间打造出一个集讲学、藏书等功能于一体的全新的遗山书院。

建设书院，首先要解决书院的定位和发展思路问题。一所现代书院，既要具备传统书院讲学、藏书的功能，也需要大胆创新，古老文脉应该与当代生活共振，具有可触摸、可体验、可延续的鲜活生命力。只有这样，元好问这个遥远而模糊的文化符号，才能成为家乡忻州每个孩子的人生镜像，才能让更多华夏儿女沐浴着遗山先生的德性精神健康成长。

建设遗山书院绝不仅仅是建设一座没有

灵魂的建筑，而是在修筑一座丰盈而高耸的精神丰碑。在忻州这座“文路九原、雅出秀容”的千年历史文化古城中，遗山书院应该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使命，不做一个“躺平”的古董，而要深刻洞悉青年一代人群的兴趣密码，将元好问的文学创作、生平成就与当代生活场景有效链接，以提供“元好问文化+”的多元体验。

书院要实现办院宗旨，还必须找到元好问精神与时代发展的契合点。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，我总结提炼出了元好问的人格魅力——孝敬父母的好儿子、尊师重长的好学生、有情有义的好丈夫、关爱儿女的好父亲、海人不倦的好老师、忠肝义胆的好朋友、忧国爱民的好官员。

书院从现存的元好问诗词里挑选出 30 多首咏家山的诗词，聘请画家制作成通俗易懂的连环画，建起了图文并茂、雅俗共赏的文化墙，将古典美学与大众的审美情趣无缝对接。此外，初步恢复了元好问幼时在福田寺读书时的旧址留月轩，使之成为青少年一代以及广大游客前来求道仰圣的文化宝地。从此，书院不再是一座孤岛，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

书院同时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，面向不同人群，结合职场生涯、家庭婚恋等话题举办系列沙龙，让传统文化成为年轻人的人生指南。周末和节假日，书院会开展读书山雅集、遗山春秋祭活动，借助社会力量传播元好问文化精神遗产；沿着元好问的足迹组织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，吸引来自周边省市的学生来参加，让大家感悟先贤的治学态度和家国情怀。衷心期望遗山书院能成为崇礼明义之地，文化自信之地，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之地，让每一位来访者都可以深刻感受到“游忻州就是读历史”的深远意义。



惬意时光

“重阳”的名称，来自《易经》中的“以阳爻为九”。农历九月初九，日与月皆逢九，是谓“两九相重”，故曰“重九”，同时又是两个阳数合在一起，故谓之“重阳”。明代张岱的《夜航船》云：“九为阳数，其日与月并应，故曰‘重阳’。”

先秦时期，各地习俗尚未融合流传，重阳节习俗鲜见于文字记载。现存与重阳节俗相关的蛛丝马迹，最早见于《吕氏春秋》：“（九月）农事备收，举五种之要。藏典籍之收于神仓，祇敬必飨……是日也，大飨帝，尝牺牲，告备于天子。”当时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，祭飨天帝祖先以谢恩德的活动，与重阳时间大致吻合。明确提到“重阳节”始见于三国曹丕的《九日与钟繇书》：“岁往月来，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”

到了汉代，《西京杂记》中有记：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蓬饵，饮菊花酒，云令人长寿。”南朝梁吴均的《续齐谐记》载：“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，长房谓曰：‘九月九日，汝家中当有灾，宜急去，令家人各作绦囊，盛茱萸以系臂，登高饮菊花酒，此祸可除。’景如言，齐家登山。夕还，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。长房问之曰：‘此可代也。’今世人九日登高饮洒，妇人带茱萸囊，盖始于此。”

东晋诗人陶渊明在



《九日闲居》一诗序文中曰：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。”孙思邈的《千金方月令》也称：“重阳日，必以看酒登高远眺，为时宴之游赏，以畅秋志。酒必采茱萸、菊以泛之，即醉而归。”唐代王维的诗句脍炙人口：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诗云：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”清代，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，“解除凶秽，以招吉祥”。

《西京杂记》中还有“食蓬饵以拔妖邪”的记述，六朝以后蓬饵改称“糕”，因“糕”与“高”谐音，象征着向上、进步、高升等。唐宋时，重阳佳节吃糕颇为流行。吕原明的《岁时杂记》中介绍宋代民俗：“九月九日天明时，以片糕搭儿女头额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祝曰‘愿儿百事俱高’，作三声。”这是古人九月做糕的本意，讲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，像宝塔之形，上面放两只小羊，以符合重阳(羊)之义。明代，官

漫话重阳

□张 汀

中宦官宫妃从农历九月初一就开始一起吃花糕庆祝，待九日重阳，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览胜，以畅秋志。

古人常将“上巳”与“重阳”即“三月三”与“九月九”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，上巳“踏青”春游则与重阳“辞青”秋游对应进行。清乾隆时潘荣陛编撰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：“（重阳）有治肴携酌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，谓之辞青。”

重阳节还是出嫁的女儿回家省亲之日，俗语有“九月九，搬回闺女歇歇手”。明代刘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云：“（九月）九日，父母家必迎女归宁，食花糕。”清代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也记载：“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……市人争买，供家堂，馈亲友……有女之家，馈遣酒礼，归宁父母，又为女儿节云。”

插茱萸、求寿、登高、享宴、食糕、辞青、省亲……这些活动在历史延续过程中逐渐成为重阳节俗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杂糅过程中，其



书香一品

初闻《龙凤歌》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）之名，我以为其寓意仅仅是“龙凤呈祥”的祝福，读后才发现，“龙凤”指向的是一对龙凤胎的命运。朱灯、朱红及其家族几代人的生活故事，与中国近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交织。作家胡学文在其中熔铸了饱满的生活经验，赋予故事以真实力量，同时又能超越现实表象，对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展开深思，显示出小说家洞悉世事、直抵本质的功力。

作者上一部长篇小说《有生》叩问的是生存韧性这一主题，以祖奶曲折传奇的百年人生来象征扎根大地的顽强生命力。读罢《有生》后，我确实想过：作者后续的创作该如何承接与超越？对任何人而言，写完一部厚重之作，都是对生命体验的巨大消耗。几年后，《龙凤歌》的问世，让我看到作者不一般的抱负。

不妨说，从《有生》到《龙凤歌》，作者探讨的主题从“如何活下去”的肉身层面转换到了“如何活得有意义”的灵魂层面。不知作者内心是否有意如此，但这的确关乎中国人从物质追求到精神安顿的生命史。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，人们进入了一个物质丰富、信息超载的时代，寻找精神寄托、寻找安身立命的意义感，变得重要起来。从主人公所经历的心灵求索中，我们未尝不能看到自己的影子。

有人说故事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基础，因为故事积累着文化，沉淀着意义，也凝聚着认同。《龙凤歌》中，每个人物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。朱灯、朱红的母亲马秋月，正是一个热爱听故事、热衷讲故事的人。这个看起来有些卑微的农村女性，生活中绝非仅有生儿育女的劳作，其对剪纸艺术的热爱、对故事的渴望，都昭示着内心世界的开阔与超越。

乡土文学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主线，在进入 21 世纪后，伴随乡村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，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与挑战。《龙凤歌》写的是乡土故事，用的却是现代的艺术结构。小说人物成长于北方乡土，亲历着城乡社会的巨大变迁，他们的生活与情感既烙印着传统的影响，又迸发出对现实和未来的渴求。作品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挖掘，以及对精神世界重要性的强调，无疑是对浮躁心态的回应。它澄澈地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活着，不能完全被外在的物质世界所左右，而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。

在作者看来，小说有两极，一极向下，是世俗生活；一极向上，是灵魂和精神。扎得深又升得高，是他心中的好小说。《龙凤歌》正是其文学观念的一次有力实践。

朝向生命意义的追寻——读胡学文的长篇小说《龙凤歌》

□王威廉



画 说



部继善 作